

迁移流动和农村女性发展: 回顾与展望

郑真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基于21世纪有关受流动影响女性的国内研究成果,可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女性在流动中的角色和流动对农村女性的影响,其内容包括人口流动与女性的作用,流动女性的劳动就业,受流动影响的婚姻家庭和健康等方面。已有研究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视角和内容,并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近年来的研究还关注到新时代新人群的特点。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还有其局限性,建议未来研究应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人口流动的“常态”化以及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同时要探讨新视角和新思路,以研究新形势下流动与女性的发展。

关键词: 人口流动; 农村女性; 劳动就业; 婚姻家庭; 健康

中图分类号: C9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8)05-0017-08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生活和事业发展的选择。以劳动力迁移为主的人口流动,即是众多选择的途径之一。在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不同地区之间的迁移流动尤其是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受到严格控制,农民走出农村的途径十分有限,农村女性主要因出嫁或跟随丈夫迁移才能够有机会到城市生活和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对外来务工经商的限制逐渐放宽,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到城市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农村女性的发展也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21世纪以来,女性在我国劳动力流动中占比近半,且以农村青年女性为主。对劳动力流动的开放

为广大农村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其作用相当于增强女性能力的“社会实验”,但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则是任何项目都不能企及的。

近年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一直稳定在2亿以上,估计当前流动女性超过1亿人,此外还有丈夫或子女流动以及本人、丈夫或子女曾经流动的女性,构成了规模庞大的受流动影响的女性群体。由于流动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占一半以上,全国人口流动也是以农村向城市流动为主,受流动影响的女性主体是农村妇女。她们的流动经历、劳动就业、婚姻家庭、健康等方面的状况,是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关注的内容。本文将以后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口流动为背景,以赋权和发展为分析框架^①,以21世纪以来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为主要资料来源,回顾和分析迁移流动在不同时期对

收稿日期: 2017-06-27

作者简介: 郑真真(1954—),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学研究。

农村女性各方面的影响,并讨论未来发展趋势和研究取向。

一、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女性的作用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流动,往往仅有数量和流向的记载,男性是迁移尤其是劳动力迁移的主体,而女性则往往是被动的从属角色。事实上,女性在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近代长三角地区出现的打工妹现象^②为例,20世纪30年代女工在主要棉纺工业城市中已占工人队伍的六成,上海棉纺工业中的女工比例更高达72.9%。这个时期的打工妹群体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新生代,她们也是当时推动城乡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农村居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入是20世纪50年代,迁入人口在很多省会城市和新兴工业城市中占相当大比例,推动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的城镇化加速。有学者估计,1950~1982年间累计约7800万人从农村迁入城镇^[1]。这些“新市民”壮大了20世纪50年代新建和扩建工矿企业的职工队伍,为当时的城镇发展和工业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这段时期的乡城迁移缺乏分性别的详细记载和深入研究,但可以推断,无论是作为工人还是随迁家属,女性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城市建设及工业化进程加速、全球化带来的沿海地区制造业快速发展、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的松动等,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稳步增长,并在20世纪的最后5年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很多地区农村青年的必经之路。随着经济型人口流动的渐趋增强,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20世纪80年代以婚迁、随迁和投亲靠友为主的流动人口中女性占多数,1990年代则转变为以年轻力壮的男性外出务工为主的流动,而农村女性大规模地参与劳动力流动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流动成本和风险的减少使更多农村女性得以外出,加入流动者行列。通过非农就业,农村女性的社会

价值和个人价值更加得以体现。随着时代的变化,农村妇女外出打工的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从早期的婚前外出、回家结婚生育不再外出,发展到不仅婚前外出、结婚生育后也外出或婚育后再次外出,既有可能本人外出、也有可能与丈夫一起外出或带子女与外出打工的丈夫团聚等多样化模式,流动妇女的构成也呈现多样化,而不仅仅限于“打工妹”了。段成荣等曾总结改革开放后30年间的流动人口变动趋势,其中包括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等,展示了女性人口流动的变迁及其对人口流动大趋势的影响^{[2][3]}。进入21世纪以后,女性外出务工人员迅速增加,2000年的女性流动人口中有48.9%的女性因经济原因迁移流动,仅比男性低12个百分点,此外以实现家庭团聚的流动日渐增多,男女两性在流动人口中的构成逐渐趋于平衡。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从1990年的44.5%上升到2005年的49.7%,规模达到7000多万人。有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在外出打工方面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劳动力的乡城流动概率快速赶上男性,其中较高学历女性的流动概率甚至开始超过男性^[4]。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10年前相比,无论是省内流动还是跨省流动,流动女性因经济原因流动比例都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与跨省流动女性相比,省内流动女性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有更高比例是专业技术人员或商业服务业人员;同时流动年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15~24岁男女两性在迁移率上升阶段的差距显著缩小^③。改革开放后的劳动力流动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女性在其中的贡献应当占四成以上。

二、流动女性的劳动就业

多数女性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到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是为了从事有更高收入的劳动。尽管有些女性的主要外出动机并不是帮助家庭维持基本生存条件,但无论是因婚嫁、随迁,还是因务工经商而流动,女性在流入地多数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李若建分析比较了1982年至2000年间

的人口普查资料,认为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相当大一部分持有农业户口的或外来的女工已经替代了本地的女工,形成一个新职业群体^[5]。2000年全国的女工当中,持农业户口的女工占63.3%,外来女工占36.8%;而广东省的外来女工则占到女工总数的74.3%。广东外来女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极少进入电力、煤气、自来水供应行业和交通通讯业这些高利润行业,外来女工较年轻,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低于本地,而且与本地女工相比,外来女工的工作强度相对更大,周工作时间超过5天的比例大大高于本地女工,前者为86.3%,后者为57.2%。面对这样一个不同特征的新女工群体,学者呼吁需要重新认识和思考她们在城市化和现代化中的作用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外来人口的流动性,既不利于女工队伍的稳定和发展,也削弱了她们争取或保护自己权益的力量。柳玉臻通过对工厂女工的访谈,介绍了用工短缺下的珠三角制衣业中,大量农村已婚流动女性进入工厂后的劳动和生活情况,分析了以“打零工”方式就业使她们更容易成为就业市场的边缘群体,很难在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对企业而言,这种做法不利于技术型工人的培养和积累,从而难以适应进一步产业升级的需要^[6]。

相对于男性流动人口而言,女性流动人口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一向相对较高,而且女性流动人口倾向于在较短时期内接受收入较低的工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例如,何明洁对成都一家酒楼女服务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况进行了长期的深入调查,生动地记述了她们成长和变化的过程,认为进城打工已经被新生代农民工视为人生的必经阶段和“成年礼”,她们之所以选择女性更为容易加入的服务业打工,是把这段经历作为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平台,或是通向新市民的阶梯或跳板^{[7][8]}。

由于劳动市场的性别分工和职业隔离,众多研究均发现女性的收入都要低于男性农民工。人口特征、流动特征、职业特征和性别特征均是

影响女性流动劳动力收入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的前提下,女性劳动力收入相对于男性而言降低了21.5%^[9],这部分无法被其他特征所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就业市场对女性的歧视和男女劳资不平等。虽然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非流动人口当中,男女两性的工资差距一向存在,但有学者比较了2005年和2011年的情况发现,农民工性别工资差距在此期间有上升趋势。不过,该差距随着教育回报的上升而缩小,因而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教育回报有助于缩小中国城镇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10]。

由于国家和各城市有关农民工的政策在21世纪发生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如果这些社会保护政策能够有效覆盖到农民工群体,应当对缩小性别差距有积极影响。一项对2006年5城市农民工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尽管在农民工的工资中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现象,但性别差异在工资分布的最高端出现了缩小的趋势,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保护政策开始覆盖这部分农民工(如签订劳动合同及四项社会保险的比例相对提高),从而矫正了性别工资差异继续拉大的趋势^[11]。该项研究发现的意義在于,现有的社会保护政策如果能有效覆盖到整个农民工群体,尤其是工资分布于低端的群体,有可能会大大缩小农民工当中的性别工资差距。

职业性别分隔历来是造成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消除职业选择中的性别歧视可以使性别工资差异缩小20%左右^④。但如果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则有可能长期滞留在低端就业而难以向上移动,从而形成男女两性之间工资收入的持久差距。还有研究发现,不同职业内部的工资和晋升方案差异,会对男、女求职者的职业选择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对女性进入高工资行业形成阻碍,这类影响能解释近1/5的性别工资差异^[12]。流动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就业不稳定等因素导致她们在工作经验方面的劣势。而就业不稳定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妇女的婚姻生育有关。一项来自北京市的调查研究,以新家庭经济为分析框

架,分析了经历家庭化迁移和城乡迁移对女性就业水平的影响,认为这种“双重迁移”下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的降低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政府应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环境和向迁移家庭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逐步释放这部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从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13]。

三、流动对农村女性婚姻家庭的影响

城市化进程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并不相同,存在着性别差异,而女性在这个进程中除了与男性一道分享收益之外,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14][15]}。从妇女地位和发展的不同维度,分别观察人口流动对流动、返乡和留守三个农村女性群体的影响可以发现,流动对农村女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为她们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对其提升地位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与男性明显不同的是,流动对农村女性的影响往往与婚姻和家庭紧密相联^⑤。

叶文振曾于2009年回顾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流动女性的婚育研究进展,认为从历史时期的纵向角度看,流动女性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变化、流动方式的变化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婚姻家庭变革,使流动女性的婚恋生育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而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以流动女性的婚恋和生育观念与行为为主题的专门研究仍相对偏少,并还存在诸多研究局限,从新兴学科如女性学的社会性别视角研究流动女性婚姻家庭问题的还非常少^[16]。

金一虹从父权制理论入手,以性别-权力视角解析父系家庭的性别结构,研究了受流动影响的农民家庭之父权制的变迁。由于农村劳动力深深卷入了全球化生产过程,使农民不得不采取在城市务工、在家乡养老养小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拆分进行的模式,男性家长权力日渐衰微,但是还不足以消解传统的影响。例如流动经历并没有改变女性农民多数在婚后从夫居的现象。无论是妻子留守还是举家迁移,她们的生活道路仍受到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约束^⑥。金一虹

认为,流动带来的个体化和居住模式变化、从原有亲属关系的束缚中抽离等,虽然部分改变了家庭权力关系和性别规范,但就父权制家庭的父系世系核心、男性优势的本质特点而言仍未有根本的改变,家庭父权制在流动变化中得以延续和重建。还有分析发现,尽管流动妇女对个人能力和价值认知、对社会层面和就业领域的男女平等认知方面已有很高的认同,但在男女家庭角色方面则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传统家庭分工,也就是说,流动经历并没有显著改变家庭内部的传统关系^⑦。

迁移流动无疑扩大了流动青年的择偶圈,也使他们在组建家庭和生育方面有了不同的选择。例如对2000年一项调查的分析显示,农村女性外出打工的经历起到了推迟结婚和生育的作用^[17];而最近的研究结果则发现,婚前流动虽然显著推迟了农村女性的初婚年龄,但推迟效应对男性农民工表现得更加明显,男性农民工在城市婚姻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18]。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多数人在流动中完成婚恋过程,夫妇共同流动比例较高,初婚年龄逐渐上升,跨省婚姻逐渐增多,而且他们当中婚前同居和婚前怀孕的现象较老一代农民工更为普遍,第一胎为婚前怀孕的比例占了42.7%,但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也增多了^[19]。

虽然目前女性流动人口构成是以经济原因流动为主,但婚姻迁移仍占相当的比例,女性婚姻移民人群始终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婚姻迁移对女性的影响更为复杂,有些女性通过出嫁到较富裕地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地位,但往往在流入地处于相对弱势地位^[20]。邓晓梅在苏南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社会适应”为主题,以“社会融合”为理论取向,以社会变迁为视角,结合整体社会结构分析农村婚姻移民社会适应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征,考察了婚姻移民迁移方式、联姻模式、社会适应的时代变迁^⑧。曹锐以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以流动人口的有关迁移理论为基础,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依据,研究流动女性随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流动经历的积

累,受传统社会性别意识以及自身社会性别意识变化双重作用影响下的婚姻质量。作者认为,流动女性的婚姻以夫妻和谐共处为主流,婚姻质量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高于农村未流动女性但低于流动男性,社会性别、流动经历、婚恋意愿、婚姻态度等因素都对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具有显著影响^⑨。

四、流动对女性健康的影响

流动女性主要集中在中青年育龄期,围绕健康和流动方面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孕产保健和生殖健康等相关内容。张灵敏回顾并评述了2000年至2013年4月国内有关流动女工健康的研究文献,总结出相关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女工的健康问题现状、流动女工健康服务状况与国家政策分析、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等三个方面,指出健康问题所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其中社会-文化因素是最常出现的分析视角^[21]。牛建林对国内1996年至2009年发表的流动女性健康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认为已有研究为了解流动女性的健康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积累了重要的知识,有助于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与管理服务,从而改善流动女性的健康状况;不过作者同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例如研究内容以生殖健康与孕产期保健为主,而对其他健康状况(尤其是生理与心理以及社会适应性)的考察相对较少,将流动女性的职业、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等与健康相结合而进行的系统研究还相当有限^⑩。

随着时代变迁,流动女性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她们的健康服务需求也具有新的特点。张妍根据2005年和2011年的两次小区域调查,分析了新生代流动妇女在健康服务需求方面的特点,指出“80后”流动妇女与上一代相比,健康保健意识更强,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利用率和参加健康服务培训活动的意愿更高,更多人选择在外出务工地生育孩子和采取自己能够控制的避孕方法,对传统的服务管理模式的排斥感更强^[22]。在江苏流动女性中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也发现,在服务需求方面存在类似的代际差异^[23]。

五、留守与返乡

随着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不断深化,整个农村人口在以不同形式经历着“流动-留守”的拆分。叶敬忠等曾对农村留守群体(主要是儿童、妇女和老人)的状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⑪。众多研究围绕农村留守女性现状、留守原因、农业女性化的问题、留守女性的婚姻关系与心理状况、留守女性的家庭决策与性别关系、留守女性的社会网络与自身发展等展开。有学者认为,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策略虽然在农村延续了小农生产方式,但对于家庭来说却是巨大的性别分工变革,也潜藏着微妙的性别关系变化。在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中,尽管丈夫与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界限清晰,即丈夫的经济贡献大于甚至远远超出妻子,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导致妻子在家庭中处于更加边缘化的权力地位^[24]。有学者对农村留守女性的劳动供给、时间安排和健康状况的分析发现,因家庭其他成员(包括丈夫、子女)的外出打工,留守农村女性与其他农村女性相比在农业生产上所付出的劳动时间更长,但却未使她们在农业生产上有更多的决策权;而且这些影响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女性来说并不相同:年轻的农村女性干得少了,年老的农村女性干得多了,同时年老农村女性的闲暇时间因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而减少^[25]。

随着第一代流动人口进入中老年阶段,加之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内地经济形势的变化,已经有不少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返回家乡或返乡就业。不过根据返乡者的报告,在通常情况下,男性返乡以经济和工作原因为主,而女性返乡的原因主要是家庭需求,如结婚、生育和照顾上学的孩子等^⑫,这显示出在返乡决策方面的性别差异。相同研究还发现,与农村非流动女性相比,返乡女性的非农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她们仍延续了在城市中的就业特征,与返乡男性相比有更高的商业服务业工作的比例。

尽管多数研究都聚焦于城市中的流动人口,也有学者将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去向置于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流转的格局之下,以农村女性劳动

力中的外出者、回流者和未外出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和回流决策及其多种影响因素,研究不同劳动力群体特征及其对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并从农村女性劳动力流转与农村教育、农业生产、农村人口增长等角度讨论了农村女性劳动力流转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⑫。有学者认为,缘于性别分工规范、父权制和从夫居的文化实践以及家庭中心主义的约束,留守农村的女性群体在流动与留守过程中承受着显著的性别排斥,从而处于更为弱势的境地。与男性相比,这是农村女性承受的额外强制力。在这种双重强制下,农村女性经历了更为严重的性别不平等^⑬。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将留守女性作为孤立群体来研究,而是将这一现象置于农村、农业与农民乃至中国的发展背景之下,同时还分析了农村社区中的非留守群体,揭示了非留守群体与社区整体劳动力流动的联系。

六、反思与展望

有学者曾利用20世纪90年代在四川和安徽的农村实地调查资料,概括总结了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外出及其影响:(1)尽管与男性相比,外出女性的收入较低,但她们同样积极地参与了经济活动,她们用外出打工的收入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2)农村外出打工女性构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网络,这些网络具有强烈的性别特征,外出打工女性依靠迁移网络的帮助缩短了外出和找工作的过程,同时这些网络也更加强化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就业的性别分工,同化了打工女性的城市经历;(3)在城市中工作的经历增强了农村女性的能力,使她们成为农村社会变化的潜在载体;(4)农村女性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限制仍然阻碍了她们的经济贡献和她们加快社会变化的载体作用,这些限制的主要核心是婚姻和对女性在家庭中传统角色的期望^⑭。回顾近20年的相关研究发现,一方面众多研究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视角和内容,另一方面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近年来还关注到新时代新人群的特点。由于有越来越多

的全国性调查含有相关内容,且数据的可得性有所改善,应用调查数据研究流动与妇女的成果更为丰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加速期,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给中国城乡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几代女性经历了这个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移流动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随着机会与资源的增加和自身能力的增强,更多女性积极主动参与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进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更具有自主意识和能动性。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有关流动与农村女性的研究明显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变化,能够及时反映21世纪以来各种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有限。例如,流动不但关系到城镇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女性的流动与留守也与新农村建设和脱贫密切相关,但目前综合这些内容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聚焦返乡妇女的调查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虽然不乏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和家庭方面的研究,但极少涉及流动女性所面临的工作和家庭兼顾问题。还有不少研究发现的问题更多与性别、收入、职业、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密切相关,流动身份或户籍并不一定是问题的根源;同时,现有研究已揭示出“80后”“90后”新一代流动女性具有与年长的流动女性显著不同的特点,并且她们在观念上与城市女性日趋接近。随着越来越多新生代年轻人进入流动行列,流动人口的构成逐渐变化,“农民工”的标签将不一定适用,似乎也没有必要总是将“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来对待。

此外,现有研究多数关注流动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或尚未解决的问题,缺乏有关流动女性对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在评价和分析迁移流动对女性的影响时,往往聚焦某个时期的某个方面,较少分析不同时期迁移流动的不同作用,更少见通过跟踪研究或流动经历回顾来评价迁移流动对农村女性的多重作用和长远影响,也包括对个人、家庭、子女以及所在社区的影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调查数据

容易获得,一些应用二手数据的研究显然缺乏通过实地调研对现实的深入了解,从而导致对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主要靠个人推断而缺乏事实依据,影响了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

人口流动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中国的人口流动在 21 世纪仍将持续。由于中国城镇化水平不算很高,而且地区差距长期存在,当医保和社保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和制度将更有利于自由迁徙,不仅劳动力的流动和人才的流动有可能成为“常态”(包括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而且会有更多老年人包括老年女性的流动。21 世纪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导致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老化,青年人口数量的缩减和青年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将进一步降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口规模。人口变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必将影响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当前有必要认真回顾和总结历史,思考新形势下研究流动与女性的新视角和思路、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使有关流动与女性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紧跟时代步伐。

注释:

- ① 参见郑真真的《人口流动对农村妇女发展的影响》,收录于谭琳主编的《2013-2015 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
- ② 参见池子华的《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
- ③ 参见郑真真的《中国女性人口流动状况与变化》,收录于谭琳主编的《2008-2012 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
- ④ 参见李实、邢春冰等的《农民工与城镇流动人口经济状况分析》,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 年版。
- ⑤ 参见郑真真、牛建林的《乡城流动与农村妇女地位》,收录于宋秀岩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 年版。
- ⑥ 参见金一虹的《中国新农村性别结构变迁研究:流动的父权》,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 ⑦ 参见郑真真的《流动妇女的男女平等价值研究——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

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6 期。

- ⑧ 参见邓晓梅的《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与时代变迁》,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年版。
- ⑨ 参见曹锐的《流动妇女婚姻质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 ⑩ 参见牛建林的《现阶段我国流动妇女健康研究综述:1996-2009 年》,收录于郑真真等的《中国流动人口:健康与教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
- ⑪ 参见叶敬忠等主编的《留守中国: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
- ⑫ 参见王东平的《流动还是留守——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女性劳动力流转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
- ⑬ 参见叶敬忠、潘璐、贺聪志的《双重强制——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
- ⑭ 参见 Cindy Fan 的《进城返乡:四川安徽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外出经历与贡献》,收录于蔡昉、白南生主编的《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

参考文献:

- [1] 马侠.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国内人口迁移及今后的展望[J].人口与经济,1987,(2):3-8.
- [2] 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人口研究,2008,(6):30-43.
- [3] 段成荣,张斐,卢雪和.中国女性流动人口状况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9,(4):11-18.
- [4] 牛建林.改革开放以来乡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教育的选择性及其变迁[J].劳动经济研究,2014,(4):121-140.
- [5] 李若建.女工:一个重生的社会阶层[J].社会学研究,2004,(4):91-97.
- [6] 柳玉臻.城乡流动与妇女发展——农村已婚妇女外出打工经验考察[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5,(1):86-89.
- [7] 何明洁.性别化年龄与女性农民工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7,(4):12-16.
- [8] 何明洁.工作:自我转换的平台[J].青年研究,2008,(2):1-9.
- [9] 段成荣,张斐,卢雪和.中国女性流动劳动力收入

- 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10 (4): 29-34.
- [10] 邢春冰, 贾淑艳, 李实. 技术进步、教育回报与中国城镇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J]. 劳动经济研究, 2014 (3): 42-62.
- [11] 王震. 基于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研究[J]. 世界经济文汇, 2010 (4): 51-63.
- [12] 陈永伟, 周羿. 职业选择、性别歧视和工资差异——对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析[J]. 劳动经济研究, 2014 (1): 49-75.
- [13] 李强. “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5): 104-110.
- [14] 谭深.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J]. 社会学研究, 1997 (1): 44-49.
- [15] 周伟文, 严晓萍, 刘中一. 生存在边缘——流动家庭[C].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1-210.
- [16] 叶文振. 流动妇女婚育研究的背景分析与展望[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9 (5): 54-60.
- [17] 郑真真. 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2): 61-65.
- [18] 许琪. 外出务工对农村男女初婚年龄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5 (2): 39-51.
- [19] 宋月萍, 张龙龙, 段成荣. 传统、冲击与嬗变——新生代农民工婚育行为探析[J]. 人口与经济, 2012 (6): 8-15.
- [20] 谭琳, 苏珊·萧特, 刘惠. “双重外来者”的生活[J]. 社会学研究, 2003 (2): 75-83.
- [21] 张灵敏. 中国大陆流动女工健康研究述评[J]. 妇女研究论丛, 2014 (4): 104-113.
- [22] 张妍. 新生代流动妇女的健康服务需求研究[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3 (4): 41-48.
- [23] 刘越, 林朝镇, 朱海燕, 刘敏, 叶郁, 王彦. 江苏省流动妇女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现状与需求的代际差异分析[J].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2011 (10): 601-606.
- [24] 吴惠芳. 留守妇女现象与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变迁[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3): 104-111.
- [25] 牧人, Dominique van de Walle. 留守妇女的劳动供给、时间安排和健康状况[J]. 劳动经济研究, 2014 (2): 16-40.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Women: Review and Prospects

ZHENG Zhen-z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732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ole of rural women in mig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to them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jor source for the review is publication in Chinese since the year of 2000. Areas reviewed includ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role of women , employment of women migrants , impacts of migration on marriage , and family and health of rural women. With similar perspectives and scopes as the researches in 1990s , later researches included more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the issue , and recent researches focused 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s in the new era. Since exiting researches all have their limitation ,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approaches with regard to social-economic context , population migration “norm” and proportional change of migrants.

Key words: population mobility; rural women; employment; marriage and family; health

(责任编辑 赵莉萍)